

再谈河原操子

包贺喜格图

(内蒙古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河原操子是在清末新政时期来中国进行教育援助的第一位日本女性教师。中日两方面对河原的评价一直以来大多集中于她的“间谍身份”，负面认识比较多。河原是不是间谍，就目前的史料来看还很难下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关于她为什么要从事针对中国人的女子教育事业，为什么决定接受远赴内蒙古的任务，为什么做了支持战争的工作，为什么她一个人身上集中了“支持战争”和“为和平而做教育”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特点等等这些问题，还有进一步思考和挖掘的空间和必要。通过对她所经历的明治时期特殊的教育环境和家庭环境，以及她的各时期言行的考察，我们会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河原操子。本文就试图从明治时期日本大陆政策主导下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这一大背景出发，通过对东亚同文会在中国的教育活动，特别是它在毓正女学堂的设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河原个人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和她的对中国教育认识进行考察分析，从而解释河原身上同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思想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 河原操子；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活动；毓正女学堂；女子教育者；战争支持者协从者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河原操子(以下略为河原)是日本明治时期派往中国(当时是清末新政时期)的第一位女教习，曾先后执教于三所学校，即日本国内的横滨大同学校、中国大陆的上海务本女学堂和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综合观察中日两方面对河原进行的论述和评价，可以发现两个较为突出的认识倾向，即前期的战争“间谍论”^①和近年的中国近代女性教育“贡献者论”。^[1]前者主要强调日俄战争背景下河原曾做过的战争支援和情报传递工作，突出其政治性，而后者则是关注于河原在中国女子教育事业上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态度、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贡献，突出其近代女子教育者的形象，并强调其教育行为对后世的积极影响。

河原究竟是不是一名间谍，以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的确难以做出明确的论断。但是，既然她是以教习身份来华的，大多数工作也集中于女性教育，那么我们也不妨以现有的可靠资料为基础，从她所身处的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大环境和家庭教育小环境来仔细观察她的言行，尝试从中获得一些对她的新的认识和结论。河原为何那样执着的想要从事中国女性教育事业？为什么“毅然”选择孤身入蒙？为什么会进行协助战争的活动？为什么在她的身上同时具有和平友好的女子教育者性质和战争支持者、协从者性质？这些问题，相信会在这种观察中得到相应的答案。

本文的目的，具体来讲就是以明治时期日本大陆政策主导下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为背景，通过对东亚同文会开展的对中国教育活动，特别是它在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成立过程中起到的核心作用，以及河原本人在此之中体现出来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和对中国教育观进行分析，解释河原身上具有的多面性现象的根源所在。正是明治时期大陆政策框架中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使河原具有了随时为国家献身的意志，这种意志最终促成了她后来的一系列“英雄”行动。从现有资料来判断，她支援中国近代女性教育事业的教育者形象应该是真实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

识到特殊教育背景使其具有的战争支持者、协从者的另一面，两者在其身上并不矛盾。

二、河原操子赴中国的背景和原因

（一）关于河原操子

河原 1875 年 6 月 5 日生于日本信州松本（现今的长野县松本市）的藩儒世家。其父河原忠为松本藩藩士、儒学者，日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后，在西町开私塾教育子弟。其母为松本丸山武左卫门家三女，“性情极其温顺”^[2]，在河原操子 14 岁时离世。河原忠因“不忍将操子托于继母之手”^[3]，四十岁后一直未再娶，独自一人抚养河原操子。

河原 8 岁时入开智学校，1890 年入长野县立师范学校女子部学习。19 岁时完成学业，其后留在母校并执教于该校的附属小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为了实现去东京深造的愿望，参加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考试合格后于 1895 年 3 月来到东京读书。二年级时因感冒患肋膜炎在千叶县千仓海岸休养一年，归校后病情复发，不得已放弃了学业。回到家乡后不久，获得了在长野县立高等女学校教授数学、理科和历史的机会，身体状况也得到恢复。

1900 年，河原主动拜见了当时在日本信越地方进行演讲巡游的华族女学校的下田歌子^②（以下略为下田）。她向下田诉说了“想要赴中国从事女子教育事业”的想法后，下田表示会“助一臂之力”。之后不久，由于下田的推荐，河原于 1900 年 9 月 22 日开始在横滨大同学校任教。1902 年 8 月，同样是在下田的推荐下，河原又赴上海务本女学堂任教，并且在务本女学堂执教一年后又转赴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王府的毓正女学堂进行女子教育活动。河原是在 1903 年 11 月离开上海，同年 12 月 21 日到达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王府的。在喀喇沁右旗王府的教育活动前后持续了两年左右，1906 年 2 月回到日本。1906 年 7 月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一宫铃太郎结婚，同年 10 月夫妇二人远赴美国。其后的家庭主妇生活十分平静，1909 年出版了《蒙古土产》一书，回顾了在上海和内蒙古时期的经历。1945 年 3 月去世，享年 71 岁。

（二）河原操子本人的国家主义教育背景

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在形式上得到确立是以 1890 年《教育敕语》的发布为标志的。但是在这之前已经有森有礼的国家主义教育实施上的摸索（1885 年至 1890 年）作为铺垫，因此从时间上看，河原的小学时代已经基本处于国家主义教育的影响之下。《教育敕语》发布后，以伊泽修二为会长的国家教育会进行了大量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各种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制度也得到广泛推行，尤其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后，日本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日本人意识空前高涨，国家主义思想得到国民的高度认同。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巩固了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日本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如此看来，包括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一段时间在内，河原的学生生涯几乎完全是在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环境下度过的。

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教育敕语》，其主旨就在于“教育一切为国家服务”、“忠君爱国”。明治政府将这一宗旨规定为当时日本国民教育的根本。如前所述，森有礼在伊藤博文的支持下，于 1885 年出任日本首任文部大臣后，效仿德国的教育样式接连发布了《学政要领》《小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令，开始尝试实施国家主义教育。他公开倡导“学术非为学术之学术，而是为国家之学术，教育非为学生之教育，而是为国家之教育。”^[4]从这一号召就可以看出，国家主义教育最终目标并非是为学术研究和个人成长服务，相反却是要把学术研究和国民个人捆绑在所谓的近代“国家”名义之下，实质上就是要以国家主义教育的方式统和国民意志，让国民养成效忠天皇、效忠国家的认识，从而在短时间内塑造出符合明治政府要求的近代“国民”，使日本尽快实现富国强兵、对外扩张的目标。河原的小学时代就是在森有礼提倡的国家主义教育政策下度过的，所以河原在小学学习阶段就已经受到“忠君爱国”观念的影响。

能够直接证明河原已经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有力证据，是笔者在《妇人公论》上首次发现的有

关河原的新资料，即河原本人所写的一篇文章——《把青春献给蒙古》中的两段话。“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之际，受战事鼓舞，觉得自己似乎也不能无所事事了，于是抱着去东京学习更多知识的想法，参加了在长野县厅举办的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不想真的通过了。我是在1895年3月21日来东京上学的。”^[5]“毕竟是与大国交战，起初还是很担心战局如何发展。但随着日本军的连战连胜，国民的热情也高涨起来，我们这些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们也经常在晚饭时聚集在学校的藤架下，高唱那首《妇人从军歌》，沉浸在无法言说的激动之中。不久战争结束，记得那年5月天皇和皇后两陛下从京都大本营回京时，我们还在二重桥列队欢迎。”^[5]

显而易见，第一段话表达了河原受甲午战争战事鼓舞，为了国家想要继续学习深造的强烈愿望。第二段话则是体现了她虽为女性，但却可以随时为国家去战斗和献身的意志。国家主义教育的效果在包括河原在内的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身上得到充分显现。此时的河原可以说已经完全成为了国家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合格“国民”，此后能够听从日本军部安排孤身赴内蒙古完成所谓的“国家任务”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河原操子赴中国的个人原因

河原之所以抱有赴中国开展女子教育事业的强烈愿望，并且后来真的做到孤身入蒙，前面所讲的国家主义教育大环境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个来自其父亲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如前所述，河原的父亲河原忠是一位儒学家，对中国持亲近的态度。据河原回想，“那时无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很重视汉学，内心中都留有对中国的崇拜思想，绝没有轻视中国的想法。父亲始终认为，为了实现日中携手给东亚带来和平，我们必须要认真研究中国情况，但同时也要以温和的心去和中国人接触，赢得他们的信赖。”^[6]河原就是这样，从小深受父亲的“日中亲善论”和“重视教育论”的影响。关于其父亲经常提起的“日中亲善的必要性”和“国家百年之计在于教育，国家富强之根本在于教育”等言论对自己的影响，河原说，“还是孩子的时候对这些深奥的道理当然不能完全明白，但与中国友好对日本来讲非常重要这一认识在不知不觉中深入脑海，不能忘记。”^[6]“我之所以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也是因为父亲一直强调教育对国家来讲尤为重要，能够从事教育这一神圣职业也是难能可贵。这种认识在我学生时代就已经铭记在心了。因此，在进入女高师学习之后，我就有了将来为中国的的教育服务的想法。”^[7]

另外，在《喀喇沁王妃与我》这本书中，也说明了决定去内蒙古的理由，“这还是父亲的日中亲善论和重视教育论影响的结果。赴蒙前后过程中虽然也有来自下田歌子先生、内田驻华公使，以及其他很多人的帮助，但根本上还是父亲的感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7]，“可以说，是父亲所持的思想影响了我造就了我。”^[7]

除了以上来自其父亲的影响之外，“自小失去母亲，父女二人相依唯命的生活”^[6]也是河原决心赴中国从事教育事业的一大内在原因。据河原回忆，“当看到、听到友人福岛安正将军单骑远游西伯利亚，同乡川岛浪速君在中国开展各种活动，父亲经常会羡慕地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去中国。”^[6]为了报答孤独一生养育自己，并时刻怀有远赴中国心愿的父亲，河原决心“要以某种方式安慰父亲，让他高兴满足。这种想法时时出现在脑海并驱动我去做些什么。因此，我去中国、去蒙古、说是尽女儿的孝心也可以，但自己感觉更多的是代替父亲去完成他没能实现的夙愿。”^[6]由此可见，通过教育活动为日中亲善为报答父亲去做些什么，这样一种来自家庭的想法也是河原决心远赴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个人原因。

总而言之，自幼接受的国家主义教育和其父亲的“日中亲善论”和“重视教育论”成为影响河原选择赴中国从事教育事业的重要因素。国家主义教育使她养成了“为国家献身”的意志，父亲的思想则让她具有了“重视教育，与中国为善”的认识。这两点最终都在她后来在上海和内蒙古的教育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河原操子赴上海和内蒙古任教的幕后推动者——下田歌子和东亚同文会

河原能够远赴中国从事女子教育，除了前述其本人的思想意志之外，在幕后为其赴中国创造机会和条件的人物和团体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在这里特别想要提到的人物是当时日本近代女子教育开创者下田歌子，而团体指的是在甲午战后积极倡导“中国保全论”的东亚同文会。

（一）赴上海务本女学堂任教的幕后推动者——下田歌子

下田歌子是日本国家主义教育的支持者、实践者，同时也是当时对中国女子教育持积极支持态度的一位指导者。她积极劝说贡王重视女子教育，设立女子学校，派遣河原操子赴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王府执教。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由于篇幅所限，不能细述，请参考拙文《下田歌子と内蒙古の近代女子教育について——内蒙古カラチン右旗毓正女学堂の設立を中心に》（以下略为《下田》）。

下田对中国女子教育抱有怎样的关心，做了哪些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下面一段河原对下田的评价中就可以略知一二。“很多人也许还不知道，下田先生可以说是当时关心支持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唯一一位日本女性。她与革命家孙中山成为友人，与中国主政者西太后慈禧有过联系，自己成立汉语研究会，在实践女子学校多方照顾中国女留学生，为派遣女教员赴中国执教特设相关的讲习所，参与创立东洋妇人协会等等，可以说为中国问题做了很多工作。很遗憾我当时没有一直在先生身边，因此不能了解更为详细的情况。但仅仅看这里所列的事项，就可以发现下田先生拥有的深刻见识和高远的报负。”^[8]

从这段评价可以看出，在日本倡导国家主义思想下的女子教育的同时，积极呼吁扶助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下田成为了河原心目中值得崇拜的人。这种基于同一教育认识而产生的敬佩之情终于驱使河原主动去拜访了正在信越地区访问的下田。当河原说出“想去中国从事教育事业”^[8]时，下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对日本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也会尽力帮助你。你要注意身体多多学习。”^[8]在河原看来，下田“以温和的话语给了我支持和激励。”^[8]由此，对中国教育认识上的一致立场把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

河原主动去拜访下田是在 1900 年 8 月 19 日，这后不久她受下田的邀请于 1900 年 9 月 22 日赴横滨大同学校女子部任教，授课对象为中国女留学生，这成为河原从事针对中国女性的女子教育的起点，在横滨大同学校工作整两年之后，河原又漂洋过海前往上海务本女学堂任教。之所以远赴上海，直接缘由是上海务本女学堂校长吴怀疚向下田发来请求，想让日本方面派一名女教师来沪支援教育。下田对这名女教师人选的要求是“具有坚强的意志和超凡的忍耐力，以及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9]河原在横滨大同学校的表现，恰好满足了下田的这一条件，成为最佳人选。这时的河原已经不仅具有针对中国人的实际教育教学经验，而且她还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汉语，为她来中国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赴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王府任教的幕后推动者——东亚同文会

如前文所述，河原在下田的邀请下进入横滨大同学校任教，初步积累了针对中国女性的教育经验。而下田之所以邀请河原，则是由于犬养毅（东亚同文会会员、横滨大同学校名誉校长，1931 年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曾向下田发来希望介绍女教师的信函。可以说正因为有了来自犬养毅的请求，才使河原有了正式开始从事她所一直希望的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机会。因此，在河原从事中国女子教育的最初阶段就已经有东亚同文会力量的间接介入了。

东亚同文会成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后东亚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欧美列强开始争相在中国设租借地，并妄图获得铁路矿山等方面更多的利权。日本在这一争夺中也试图获得一些利益，但整体来讲处于下风，特别是面对俄国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显得对抗乏力。俄国在 1896 年与清政府缔结《俄中同盟密约》，企图实际占领满洲。并且在此之后获得大连、旅顺的 25 年租借权，以及南满铁路铺设权和该地区的矿山开采权，其势力逐步扩大，大有进占朝鲜的势头。在西方列强，特

别是俄国的强势扩张之下，日本认识到自己力量的薄弱，感觉到俄国对其所谓的“利益线”^③的巨大威胁。在此状况之下，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中国的存亡决定日本安危的言论，并有许多政治人物和团体开始主张联合中国对抗俄国。

与日本情况相对应的是，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也开始了教育方面的反省和思考。康有为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④梁启超也发表了有关教育重要性的意见，他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⑤在此种认识的大环境中，1898年7月，张之洞的《劝学篇》也终于问世，并得到清政府的认可。《劝学篇》极力倡导留学生游学日本，向日本学习各种技术和知识。由此，中日教育交流的“蜜月期”（甲午战争之后至辛亥革命持续了十几年时间）拉开了序幕。在日本方面的危机意识和中国方面留学日本风潮的影响之下，1898年11月2日，以近卫笃磨为会长的东亚同文会（合并了之前的东亚会和同文会）正式成立。

东亚同文会极其重视在华教育活动，在“保全中国”的大方针下，以“图谋中国之富强”和“巩固日中相互提携之基础”为口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⑥。以往研究中关于东亚同文会及其教育机构东亚同文书院的评价褒贬不一，有认为其为侵略中国服务的，有强调其人才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的，也有同时指出其侵略性和教育贡献并存的所谓“两面性”研究评价。综合分析之后，笔者认为蔡数道（2009）的研究比较客观地论述了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教育活动的根本性质，蔡（2009）对东亚同文书院的“人才养成”进行了具体考察，对其教育教学内容以及毕业生的就职情况、毕业后的活动领域做了数据调查分析，得出了东亚同文书院的“人才养成”比较注重培养对日本势力在中国扩张有现实帮助的外交领域和经济领域人才的结论，由此，他认为，“基于这一情况（指前述人才培养方向——笔者加），使我们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定位问题上，不得不从既有的单纯教育角度的认识向更新更深的认识转变，重新审视它。当然，不能武断的说东亚同文会在中国的所有教育活动都具有侵略性，但是从其教育过程和结果来看，东亚同文书院很大程度上可以认定为日本政府为在中国扩张势力所利用的据点。”^[10]“作为在中国教育活动的重要一环，东亚同文书院的教育活动虽然是在亚洲提携合作和中日亲善的美名下运行的，但是它带来的绝对不是事实上的日中两国的相互提携和繁荣。东亚同文书院的出现虽然曾经受到邻国中国出于对教育合作繁荣认同基础上的支持和称赞，但是其教育活动过程和内容中还是隐藏了企图侵略中国的暗影。”^[11]“该书院应该说是为培养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人才，或者说是适合在中国大陆活动的人才而设立的教育机构，进一步讲，可以说是谍报人员的养成所。”^[12]

蔡（2009）的论述虽然仅限于东亚同文书院，但是从东亚同文书院在东亚同文会教育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它存在的时间之长，毕业人数之多，毕业生的历史作用等等情况来看，它在东亚同文会的中国教育活动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从对东亚同文书院的观察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到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策略中所包含的一方面性质，简而言之，就是以教育为手段向大陆渗透，在学习了解对方国家实际情况的同时取得对方国家国民的精神层面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使日本在与俄国为主要对象的西方列强的对抗中获得相对的优势，最终实现自身势力进入中国大陆的企图。当然，东亚同文会的这种教育渗透扩张策略不仅从东亚同文书院的教育活动中可以看到，在日俄战争前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的毓正女学堂的成立过程中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河原入蒙的经过在《下田》一文中已经进行了说明，不加赘述。这里想要补充强调的一点，就是东亚同文会在河原入蒙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幕后策划推动作用。首先我们把与毓正女学堂成立相关的日本方面人物做一排列的话，会出现川岛浪速^⑦、佐佐木安五郎^⑧、内田康哉^⑨、小田切万寿之助^⑩、下田歌子、福岛安正^⑪、青木宣纯^⑫、伊藤柳太郎^⑬等名字。除了教育家下田歌子和陆军军人福岛安正、青木宣纯、伊藤柳太郎等人外，其他人全部为东亚同文会会员。

东亚同文会对内蒙古工作的这些人中，核心人物是川岛浪速（东亚同文会会员）。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时期，川岛以日本陆军随军翻译官的身份来到北京。他与日本陆军少将福岛安正关系密

切，两人为同乡。其最初打算来中国时就接受了福岛安正的资助[13]，成为日本派遣军随军翻译来到北京也是由于时任派遣军指挥官福岛安正的要求[14]，因此他与当时日本军部来往很多，关系密切。川岛自1902年至1903年间，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大佐“屡次秘密会谈商议”，策划了贡王1903年的日本之行[15]。不仅如此，在毓正女学堂成立之后，日本军部派往喀喇沁右旗的特别任务班中，“一半的班员都是由川岛培养选拔的。”[16]

除此之外，川岛还借在北京设立警务学堂等机会，广泛结交清朝官吏，在与肃亲王的交往中两人甚至结为兄弟，肃亲王的亲日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川岛的影响。由于肃亲王的妹妹嫁给了喀喇沁右旗郡王贡桑诺尔布，所以川岛也就有了极好的与蒙古王公，特别是贡王联系的渠道。与日本外务省方面的关系上，川岛还与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东京外国语学校时期的同学。[17]当然，与河原的父亲为同乡和世交在前文已有交代。由此可见，川岛是当时可以联结日本军部、外务省，以及中国朝廷大员、蒙古王公的重要人物，对东亚同文会的对内蒙古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亚同文会除了川岛浪速之外还有一名会员当时也活跃在对内蒙古工作前线，他就是佐佐木安五郎。在当时“日俄战争前，内蒙古方面几乎没有日本人出入活动的情况”[18]下，他在“得到喀喇沁王的帮助下，1902年和1903年这段时间里频繁出入内蒙古，策划一些活动。”[18]这当然是“由于他是川岛的妹婿，通过川岛与肃亲王的关系，肃亲王与喀喇沁王的关系，获得了很多深入内蒙古活动的便利条件。”[18]佐佐木安五郎在内蒙古活动的这一时间恰好与贡王赴日本考察和设立毓正女学堂的时间一致。

有关佐佐木安五郎在内蒙古活动的时间，除了1902年和1903年之外，还有1901年的记载。《日本与蒙古一百年》一书中就提到“佐佐木安五郎接受土仓鹤松的援助，与中川宗之助、岩崎铁彦访问喀喇沁王府。”[19]同年，“伊藤柳太郎大尉在北京与贡王约定派遣日本教师。”[19]这些记载说明在崇正学堂设立之前日本方面就已经开始了对内蒙古的渗透工作。

东亚同文会主动参与对内蒙古工作，除了川岛和佐佐木的行动之外，还有两个事例可以证明。一个是川岛陪同贡王启程赴日本参加大阪万国劝业博览会时，东亚同文会会员牧卷次郎于1903年3月23日给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磨的信中报告了贡王启程的情况，以及“近来俄国对蒙古王公的怀柔政策已经逐步取得成效”等信息。此外在信的末尾还有“详细情况请届时向川岛问询”的内容。[20]由此信函可以窥见近卫笃磨也对贡王赴日给与了高度关注，说明东亚同文会自上而下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视。

另一件事例就是东亚同文会1903年5月春季大会之时，干事长根津一的事务报告中，会员介绍一项里明确记载着“今次清国戴振、肃亲王令郎、喀喇沁王、蒙古王各殿下成为本会名誉会员，本会荣幸之至。”[21]从时间上看，应是贡王赴日之后不久。这又说明东亚同文会借贡王赴日之际开展了大量的笼络工作，其对内蒙古工作是有计划有安排有具体目的的。贡王成为东亚同文会的名誉会员，可以说明贡王已经完全倒向支持日本一边，这也可以解释其后来为日本特别任务班提供各种支援的行为为何发生。依此可以认为，此时日本与贡王之间已经取得了相互的信任，为下一步毓正女学堂和守正武学堂的设立，以及日本方面凭借两学堂采取各种对俄军事准备行动创造了条件。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初日俄战争前日本针对内蒙古的渗透工作是日本外务省、军部、政界、财界、教育界等各方协同进行的，有计划有目标的国家行动。东亚同文会正是在此之中集中动员各方面会员的力量，为日本势力进入内蒙古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从教育活动看河原操子

（一）作为女子教育者的河原操子

如前文所述，河原受其父亲的“日中亲善”思想影响很大。甲午战后，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态

度不断升级，但河原却丝毫没有一点厌弃中国的想法。关于这方面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她曾说：“甲午战争带给我的感受，使我的心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了。当大家在一起讨论毕业后的理想时，很多人都表示要争取留校或是想学习英语，只有我一个人说要学习汉语，这引来大家的诧异和取笑（东京女高师时的回忆——笔者加）。”[5]另外，对于应该以何种态度与中国学生相处，她曾回忆在横滨大同学校任教时的经历，“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之时，我国人经常对中国人表示出毫无必要的优越感。这首先会伤害对方的感情，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出于真心出于同情对她们显示出友好，她们也不会感谢，反而常带有反感。屡屡目睹此情景，我认识到如此这般决不会做到善导对方，中日相互提携维护东亚和平的愿望也不会得到实现。因此，我就想到能否亲自去她们的国家，与她们中较有能力的女性结交为友，互相影响，以至于能够助成男人的事业，使内外协力，最终实现两国国运的伸张和人类的和平。”[22]河原在充分表明应该心怀善意地与中国人接触这一个人立场的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了自己所希望的中国女子教育事业具有怎样的友好和平目标。

“实际上，我去中国任教，并不是要去教导中国人，相反，我是想要从中国学习到更多的学问和知识，这种愿望非常强烈。”[23]河原正是在这样一种对中国的向往中开始着手进行赴中国任教的各种准备工作的。首先，她觉得“去中国应该先学一些汉语为好”[23]，于是开始跟随横滨大同学校的中国教师学习汉语。除了汉语之外，她还开始学习法语，因为她认为“去中国之后，会经常与西洋人见面，与之交流时不能有损日本人的颜面。”[23]

除了语言学习的准备之外，河原还在横滨大同学校的教育实践中认真思考对中国女性的教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最为妥当。她曾总结说：“对中国人进行教育活动，作为教师有必要采取一种适度宽容的态度，给学生以较为宽松的学习环境。对很多中国学生要做到既不使其感到压抑，又不使其觉得过于放松，在两者间取得一种平衡是教育成功的关键。”[22]另外，对于具体教学方法，她说：“我所承担的课程是日语课，一直在使用日本的小学校读本进行授课。从教学效果来看，手工课（如编织课）似乎成绩更为显著。也就是说，与实际用眼睛看不到的各种学问知识相比，那些可看到的，如制衣、织袜子等方面技能的学习更能引发中国学生的兴趣。这些都是在教学过程中一点点明白的。”[23]这种对手工课的认识，后来在上海和内蒙古的实际教学中均有体现，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河原在上海务本女学堂教授的课程种类较多，有日语、算术、唱歌、图画等等。对于当时的教学情况，她回忆说：“学生们对各门课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都非常认真地学习。作为老师，我也有很大的教学动力，从中获得莫大的安慰。”[24]作为教学效果，“图画很快就成了上海务本女学堂学生的一大特长，而在语言方面，学生们在半年后已经能够很熟练地使用日语。”[25]河原以日本小学校为参照，制定各课程内容，分编班级，在时间和各项纪律上对学生严格要求。由此，务本女学堂的女子教育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河原本人也非常满足于务本女学堂教育的成功，她也认为“女学堂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受务本女学堂成功的影响，中国各地开始创办女子学校，务本女学堂的毕业生也开始奔赴中国各地的女学堂任教。的确可以说，务本学堂揭开了中国女子教育史的新篇章。”[26]务本女子学堂的教育成就非一人之功，但河原的重要作用应该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在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的教育活动中，河原也是起到了核心作用。从女学堂章程的制定到学校桌椅的制作，每件事都亲自指导。她所担任的课程也很多，有日语、算术、图画、唱歌、体操、家政、手工（织物）等。为了让更多的女孩子接受学校教育，她开办园游会，以此为机会向更多的人展示教育带来的好处。为了促进学生们学习日语，她设立了同窗谈话会，为学生创造更多用日语交流的机会。在这样认真的努力之下，毓正女学堂的教学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从学生们的日语书信中就可以发现，她们的日语能力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河原主导下的毓正女学堂不仅使学生们获取了日语、历史、地理、手工等具体知识，还为内蒙古地区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喀喇沁王妃善坤给下田歌子的信中所说“敝地教化未与人民顽陋，女学尤所未讲。去年曾创办学堂以开风气，唯师范难求，幸令徒河原女史具此热心，不以寒苦肯来教授，感佩之至。兹末年余而进步之速实出意外，将来敝地妇女之输入文明，无非出自先生。”[27]这表明了喀喇沁右旗贡王和王妃方面对下田歌子和河原的感谢之情，当然同时也是对河原教育成绩的充分肯定。

由以上分析来看，河原是以认真的态度对待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这种态度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以平等的姿态耐心细致指导学生、对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严肃思考和设计、以及其教学活动最终带来的积极效果和影响等方面。综合观察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对河原所呈现出来的女子教育者形象给予充分的肯定。

（二）作为战争支持者、协从者的河原操子

我们虽然可以对河原在中国女子教育事业上的成绩给予肯定，但是仔细观察其走过的三个学校教育阶段（即横滨大同学校，上海务本女学堂，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会发现毓正女学堂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政治色彩更多一些。这主要是由于日本陆军军部与东亚同文会在幕后的策划行动，使河原原来较为单纯的“教育支援”行动，带有了国家主义战争侵略的性质。

关于河原的“间谍论”由来已久，对于有人怀疑自己具有间谍身份，她曾极力反驳。她说：“如果说是间谍或特务的话，那应该是乔装打扮并以某种身份潜入敌人内部，密秘侦察敌方的情况。但是我是作为女老师公开住在王府内，主要工作也只是女学堂的教学任务，兼有起到一些增进喀喇沁王和王妃的亲日思想的作用。当然也做了一些与特别任务班有关的联络工作，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间谍特务工作。作为一名日本人，当有值得怀疑的人出入王府、有可能做一些不利于日本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积极地报告。这些报告都属于仅供有关方面参考判断的内容。因此，我的行为与以欺瞒的手段探知敌方秘密的间谍行为是有根本上的区别的。” [28]

河原究竟是否是间谍，以目前的资料来看的确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她对战争的认识，以及她在接受军部的入蒙任务和具体从事教育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国家主义”态度，就会从中观察到在她身上存在的另一个侧面——“战争支持者、协从者”。

河原一生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各个战争时期。前面也提到过，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她正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听到“日本军连战连胜”的消息，她和同学们“每天高唱《妇人从军歌》，沉浸在激动情绪之中”，而不久两国之间战事结束之后，又“在二重桥列队欢迎天皇和皇后两陛下从京都大本营回京。”这些行为都从侧面说明河原对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支持态度。

在日俄战争时期，河原直接接受军部的任务，深入内蒙古从事一些联络工作，成为了一名战争的实际协从者。正如前文所论述的，这些行动背后是她自小学阶段就开始接受的国家主义教育在起作用，尤其是甲午战争时得到充分体现的“为国家献身”意识使其有了孤身入蒙的绝大勇气。

与横滨和上海时的情况不同，河原从一开始就感到了赴内蒙古所面临的危险。因此她“在内蒙古期间一直带着护身的短剑，一刻不离身。” [7] 即便如此，“当内田公使第一次向我说明任务的时候，青木大佐叮嘱我注意事项的时候，我丝毫没有退缩的念头。只是感觉这是为国尽忠效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29] 对于授受这项任务的理由，她说，“并不是我的爱国心有多么强烈，任何一位日本女性，当国家危难之际，可以有一个机会为国效力的话，都会不顾自身安危坚持下去做的。” [30] 这段话真切地反映了国家主义教育的力量在河原身上发挥了怎样巨大的作用。这时河原的教育活动的目的，已经不仅是横滨大同学校和上海务本女学堂时期的单纯的中日亲善和东亚和平了，孤身入蒙的背后，为战争而设定的国家任务使她的教育活动增加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在这种“为国献身”意识主导下，协助军方特别任务班执行任务、与北京公使馆保持通信联络等行为，在河原看来也就属于日本国民应尽的义务了。这样的认识，使河原在喀喇沁的教育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教育侵略扩张倾向，正如她自己所说，“为了使蒙古的女子教育尽可能按日本方式发展，为了使该地区成为日本的根据地，我在女学堂教育中特别注重日本语和日本文字的教授，让她们唱日本学校歌曲，把日本的纪元节、天长节、地久节作为休息日……。” [31] 这正是要在“精神上占领内蒙古”的具体体现，与川岛浪速的对内蒙古工作意图，即“在蒙古方面构筑一堵无形的

墙壁，阻止俄国对中国内地的入侵”、“实现精神上占领内蒙古，并逐步使蒙古方面的实力人物倾向于亲日主义”^[32]这样的侵略扩张思想本质上是是一致的。

这里还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河原的回忆文章里还有这样一段话，“大东亚战争开始以来已经两年了，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战斗越来越激烈，特别是所罗门群岛方面空战的惨烈程度超出我们的想像。通过广播和报纸听到读到这些消息，我不禁要对我方的将军士兵致以发自内心的感谢。”^[33]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河原对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军事行动也是持坚决支持的立场，这也说明河原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战争支持者”。

五、结语

河原在回忆中反复强调自己是一名女子教育者，反对别人对自己的间谍论断。她说：“对中国女性的教育活动是我的本职工作，是自己争取机会想要从事的事业，对此我有自信也有兴趣。让女孩子们唱日本校歌，看她们的日语变得越来越流利，自己心里对她们的喜爱也就更多，对工作也就越发的积极了。在内蒙古期间，1904年夏季时国家交给的任务告一段落，我不必再做相关的事情，而此时恰好是教育效果显现的时候。喀喇沁王和王妃都对此非常满意，周围人对我的信任也逐步加深。我很高兴自己的理想变为现实，高兴之余甚至想按王妃说的那样在内蒙古长住，甚至想到要把父亲接来同住，现在回想当初来蒙古的理由，为国献身协助军方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是从实际结果来看，归根结底教育是自己的核心事业。”^[34]

前面的分析表明，从教育活动中可以看到河原的女子教育者的一面，但从其在内蒙古的活动又可以发现其“战争支持者、协从者”的一面。自幼从国家和家庭两个层面接受的国家主义思想熏陶，使河原在国家有事之时，能够具有“为国献身的勇气”。明治以来“一切为了国家”这样一个口号，在河原身上变为了实际的行动，国家主义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河原注定会成为日本扩张侵略政策的实际支持者。

和平友好意识与支持战争意识，女子教育者形象和战争支持者、协从者形象同时集中在了河原一个人身上。这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我们在对其进行考察和分析时，如果偏重于其中的任何一方，对她的最终评价都会产生根本性的差异。作为本文的观点，一方面对河原个人怀着中日友好、东亚和平的美好愿望来中国执教，援助中国女子教育的行为给与肯定，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在当时特殊环境下河原所具有的战争支持者、协从者特征。日本明治以来的国家主义教育对河原的影响，以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值得更多关注的重大问题。

附：下田歌子简历

下田歌子 1854 年生于日本岐阜县。其祖父、父亲均为儒学家。下田自幼学习诗歌，1872 年入宫后，其诗歌才能被昭宪皇太后赏识，被赐予“歌子”之名。1880 年与下田猛雄结婚，4 年后丈夫病死。1885 年出任华族女学校学监兼教授。之后 20 多年从事华族教育。1893 年至 1895 年为进行皇女教育以及了解先进国家女子教育情况赴欧洲考察。归国后，1898 年设立“帝国妇人协会”，并发行刊物《日本妇人》。1899 年成立实践女学校，1901 年实践女学校开始招收中国女子留学生。1902 年在中国上海设立出版社“作新社”，将日文书籍译为汉语出版发行。1907 年辞去学习院（旧华族女学校）职务，专心于大众妇女教育。1920 年就任爱国妇人会会长。1936 年离世。享年 82 岁。

注释

①以渡边龙策《女探》（1965 年，早川书房）为代表的中日两国的研究

②请参考论文后附下田歌子简历

③山县有朋军备意见书》(1890年3月)“利益线”“主权线”言论的出现,意味着日本大陆政策正式形成。

④康有为所说。引自陈景磐、陈学恂主编(1997)《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P312

⑤梁启超所说。引自陈景磐、陈学恂主编(1997)《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P438

⑥前身为1900年5月成立的南京同文书院,因义和团运动影响迁至上海,1901年改名为东亚同文书院。

⑦川岛浪速(1866—1949),东亚同文会会员,1886年赴上海,甲午战争时作为翻译官从军,义和团运动时也成为日本派遣军翻译官来到北京。之后任北京警务学堂校长,与肃亲王等结交,辛亥革命后策划第一、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⑧佐佐木安五郎,东亚同文会会员,川岛浪速妹婿,因熟悉内蒙古情况,被日本人称为“蒙古王”。

⑨内田康哉,东亚同文会会员,当时日本驻华公使。

⑩小田切万寿之助,东亚同文会会员,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⑪福岛安正,日本陆军军人,义和团运动时日本派遣军指挥官,建议并帮助贡王设立守正武备学堂。与川岛浪速和河原操子同乡,最后军衔为陆军大将。

⑫青木宣纯,日本陆军军人,当时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特别任务班总指挥。

⑬伊藤柳太郎,日本陆军军人,特别任务班第一班班长,被贡王聘为守正武备学堂教官。

参考文献

[1] 孟根格日勒.为蒙古人子女教育作出贡献的两位日本女性[A].旅の文化研究所研究報告 12[C]. 2003.

布日其格.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与河原操子[M].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 2009.

[2] 一宫操子.把青春献给蒙古[J].妇人公论, 24 卷 12 号, 1939. 130.

[3] 河原操子.喀喇沁王妃和我[M].芙蓉书房, 1969. 24.

[4] 堀松武一.日本近代教育史—明治の国家と教育[M].理想社, 1959. 145.

[5] 把青春献给蒙古[M].第 132 页.

[6] 把青春献给蒙古[M].第 131 页.

[7] 喀喇沁王妃和我[M].第 23 页.

[8] 把青春献给蒙古[M].第 133 页.

[9] 把青春献给蒙古[M].第 136 页.

[10] 蔡数道.東亜同文会の中国教育事業に関する一考察[M].中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年報[C].第 14 号, 2009. 132.

[11] 東亜同文会の中国教育事業に関する一考察[M].第 132 页.

[12] 東亜同文会の中国教育事業に関する一考察[M].第 132—133 页.

[13] 东亚同文会.续对支回顾录下[M].原书房, 1981. 199.

[14] 东亚同文会.续对支回顾录下[M].原书房, 1981. 201.

[15] 会田勉.川島浪速翁[M].文萃阁, 1936. 94.

[16] 东亚同文会.续对支回顾录下[M].原书房, 1981. 203.

[17] 东亚同文会.续对支回顾录下[M].原书房, 1981. 199.

[18] 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记传[M].原书房, 1966. 354.

[19] 春日行雄.日本与蒙古一百年[M].亚洲博物馆, 蒙古馆, 1993. 12.

[20] 横田素子.内蒙古カラチン右旗学堂生徒の日本留学[A].アジア民族造形学会誌 5[C].アジア民族造形文化研究所, 2005. 2.

[21] 东亚文化研究所.东亚同文会史[M].财团法人霞山会, 1988. 360.

[22] 喀喇沁王妃和我[M].第 108 页.

[23] 把青春献给蒙古[M].第 134 页.

- [24]喀喇沁王妃和我[M].第116页.
- [25]喀喇沁王妃和我[M].第117页.
- [26]把青春献给蒙古[M].第140页.
- [27]喀喇沁王妃和我[,M].第263页.
- [28]喀喇沁王妃和我[M].第29页.
- [29]喀喇沁王妃和我[M].第24页.
- [30]喀喇沁王妃和我[M].第30页.
- [31]喀喇沁王妃和我[M].第252页.
- [32]川岛浪速翁[M].第93页.
- [33]喀喇沁王妃和我[M].第39页.
- [34]喀喇沁王妃和我[M].第31—32页.

A Consideration of Kawaharamisako

BAO Hexigetü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uhhot 010021)

Abstract: Kawaharamisako is the first Japanese woman teacher who went to China for educational suppor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1901 to 1911. There are more than fifty articles and chronicles on Kawaharamisako, which mainly make negative comments on her identity as a spy. It is hard to conclude that she is a spy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historical data.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further ponder and probe into the following problems: Why was she engaged in the female education of China? Why was she determined to accept the task of going to Inner Mongolia? Why did she do the work for supporting the war? Why did she have the seemingly conflicting features: to support the war and to teacher for peace? By researching in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family background which she experienced in the special Meiji Period and her words and deeds in different periods, a relatively real Kawaharamisako can be see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educational ideology of nationalism was predominated by the continental policy of Japan in Meiji period. Then it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Toadobunkai in China, particularly its function in establishing the Yuzheng Female School, the nationalistic educational ideology of Kawaharamisako and her recognition of the education of China. Eventually, it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her two ideologies of different natures.

Key words: Kawaharamisako, nationalistic educational ideology,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Toadobunkai in China, Yuzheng Female School, educator, supporters of the war

收稿日期: 2013-11-18;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清末至1945年内蒙古地区日本语教育状况及其对内蒙古地区影响

研究”(NJSY11008);

作者简介: 包贺喜格图(1972-), 男, 蒙古族, 籍贯为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日语语言学和日语教育史方面的研究。